

新解 庄子哲学

郭勇健 著



A New
Interpretation
of Zhuangzi's
Philosophy

郭勇健 著

庄子哲学新解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哲学新解 / 郭勇健著. --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5201-3660-0

I. ①庄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庄周(约前369-前286) - 哲学思想 - 研究 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32898号

庄子哲学新解

著 者 / 郭勇健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任文武 周雪林

责任编辑 / 周雪林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区域发展出版中心(010)59367143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(010)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4.5 字 数: 413千字

版 次 /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201-3660-0

定 价 / 8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(010-59367028)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(Supported by the
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)

项目名称：现象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与美学

项目编号：20720140026

目 录

导论 庄子与《庄子》	/ 1
第一节 庄子其人	/ 2
1. 庄子者，蒙人也	/ 2
2. 诋訛孔子之徒；剝剥儒、墨	/ 6
3. 周尝为蒙漆园吏	/ 10
4. 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	/ 12
5. 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；以明老子之术	/ 15
6.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	/ 26
第二节 《庄子》其书	/ 29
7.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；皆空语无事实	/ 29
8. 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	/ 32
第一章 《逍遥游》	/ 45
第一节 小大之辩	/ 46
1. 北冥与南冥	/ 46
2. “小大之辩”分析	/ 53
3. 《秋水》与《逍遥游》	/ 57
第二节 逍遥之人	/ 61
4. 郭象的逍遥观	/ 61
5. 支遁的逍遥观	/ 68
6. 无待与逍遥	/ 73



第三节 无用之用	/ 79
7. 惠子与庄子	/ 79
8. 无用之用与逍遥之游	/ 84
第二章 《齐物论》	/ 93
第一节 为何齐与如何齐	/ 94
1. 时代与人生	/ 94
2. 吾丧我	/ 100
第二节 成心与是非	/ 112
3. 成心或视角	/ 112
4. 语言的痛苦	/ 119
第三节 整体视域与终极视域	/ 131
5. 作为整体视域的道	/ 131
6. 作为终极视域的道	/ 137
7. 道的终极性和整体性	/ 143
第四节 齐物与审美	/ 147
8. 道通为一	/ 147
9. 守望的距离	/ 157
第三章 《养生主》	/ 165
第一节 何谓养生	/ 166
1. 养生并非养心	/ 166
2. 养生并非养神	/ 172
3. 养生并非养形	/ 184
第二节 如何养生	/ 191
4. 卸下生命的重负	/ 191
5. 养生的基本原则	/ 206
第四章 《人间世》	/ 216
第一节 入世	/ 218
1.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	/ 218

2. 心斋：本体层与作用层	/ 221
3. 心斋之心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	/ 233
第二节 游世	/ 239
4. 虚而待物	/ 239
5. 乘物以游心	/ 243
第三节 避世	/ 251
6. 楚狂人与桃源人	/ 251
第五章 《德充符》	/ 260
第一节 不言之教与无言之美	/ 261
1. 不言之教	/ 261
2. 无言之美	/ 265
第二节 残缺之美与怪丑之美	/ 269
3. 残缺与整全	/ 269
4. “形骸之内”与“形骸之外”	/ 272
5. 形与德	/ 278
第三节 审美经验与无情之辩	/ 283
6. 庄子与斯多葛派	/ 283
第六章 《大宗师》	/ 291
第一节 天人之际	/ 292
1. 真人与真知	/ 292
2. 天人相分	/ 299
3. 天人合一	/ 304
第二节 道成肉身	/ 312
4. 目击而道存	/ 312
5. 境界形上学	/ 319
第三节 勘破生死	/ 328
6. 死亡与哲学	/ 328
7. 勘破生死的三个概念	/ 334



第七章 《应帝王》	/ 346
第一节 为政之道	/ 348
1. “应”的意义	/ 348
2. 有为与无为	/ 353
第二节 不测之境	/ 361
3. 壶子的境界	/ 361
4. 浑沌的寓言	/ 368
结语 从心灵哲学到身体哲学	/ 373

| 导论 |

庄子与《庄子》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汉武帝刘彻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已经过去了大约 30 年。在汉武帝之前，道家思想是学术的主流。汉高祖刘邦本人就颇有几分道家的气质，他的“帝王师”张良更是史上难得一见的“道家者流”。文帝、景帝这两大皇帝，曹参、陈平这两大丞相都是道家思想的践行者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窦太后。她是文帝的皇后、景帝的母亲、武帝的祖母，史家称她是中国最后一位推崇“黄老之学”，强调“无为而治”的统治者。“窦太后好黄老言，不悦儒术”（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），在她掌权期间，规定皇帝、太子和窦家诸人都要读《老子》，赋道家学说以官方哲学的地位。不过，汉初所信奉的道家思想，乃是“黄老之学”，而非后世的“老庄思想”。

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庄子的学说，在汉初几乎销声匿迹，在整个汉代数百年间也基本上默默无闻。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。因此，虽然司马迁本人相当欣赏道家的学说，甚至被班彪、班固父子讥为“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而先黄、老而后六经”（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），然而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并没有为庄子单独列传，而只是在《老子韩非列传》中附带提及庄子。既是附属性的，自然要简单化了。司马迁惜墨如金，仅分配给庄子少得可怜的两三百字，较之他将孔子纳入“世家”、誉为“至圣”，以及对孔子长篇大论的做法，几有天渊之别。司马迁写道：

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



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胠箝》，以诋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《畏累虚》《亢桑子》之属^①，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剝削儒、墨，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沈洋自恣以适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羈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
以上就是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关于庄子的全部文字。从司马迁书写传记的做法和文字的内容来看，他显然更重视老子而非庄子，这或许与汉初“黄老”风行的学术氛围有关。到了魏晋时期，庄子突然占据了思想的中心，“老庄”一劳永逸地取“黄老”而代之。魏晋之后，中国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喜欢庄子的。无论他是做文学的还是做哲学的，也无论他是属于儒家的还是属于佛家的。即便是表面上批判庄子，骨子里头也还是喜欢。庄子思想的传人，几乎历代皆有。如魏晋之阮籍、嵇康、陶潜，唐之李白，宋之苏轼，清之曹雪芹……时至今日，我们对《庄子》的阅读兴趣已然不亚于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。然而，除了《庄子》，我们也仅能从司马迁的这寥寥数行中去了解历史上的庄子。

司马迁的描写极尽简略，实则要言不烦，几乎每句都可以琢磨一番，在这不足 300 字的描述中，至少可以引出 8 个比较重要的话题。而这 8 个话题，又可以分为“庄子其人”与“《庄子》其书”两个部分。

第一节 庄子其人

1. 庄子者，蒙人也

“庄子者，蒙人也。”司马迁的这句话写得一清二楚，没有任何歧义，但

^① 一般认为，《畏累虚》和《亢桑子》是司马迁提到的《庄子》一书的篇名，不过这是司马迁的笔误。今本《庄子》杂篇中有《庚桑楚》，大概就是司马迁所说的《亢桑子》，而《庚桑楚》中有“畏垒之山”的字眼，大概就是司马迁笔下《畏累虚》之由来。

它有一个缺陷，就是不曾写出“蒙”的国属。这种表述，相当于我们现在说某某人是法兰克福人、纽约人、横滨人、上海人，不必特地指明他所属的国家，但是人人都可以意会。想来司马迁也是觉得“蒙”在哪里、属于哪个国家，是不言而喻的。汉代毕竟距先秦不远，故而，要知道庄子到底是哪一国的人，我们也得求助于能够“意会”的汉代学者。能够提供这种帮助的学者有两个。刘向在《别录》中注明庄子为“宋之蒙人”，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注上“名周，宋人”。于是，庄子的国籍就此确定了，他是宋国人。

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强国，“春秋五霸”中就有宋襄王。宋都睢阳，即今河南省商丘县。因此，古蒙城当在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附近。但是，现在的安徽省蒙城县，也被认为是庄子的故乡。蒙城酿造的酒，取名为“庄子酒”。蒙城北郊还有一个“庄子祠堂”，如今乃是旅游胜地，其得名之由来，主要是宋代苏轼的一篇《庄子祠堂记》。苏轼把安徽的蒙城当成《史记》中的“蒙”了。有学者指出：“现今之安徽蒙城，汉时称山桑，唐天宝元年始改称蒙城。宋代学者如苏轼、王安石未遑细察，竟将此蒙城认定为庄子故里，亦属疏误。”^①这种辨析应当是可以接受的。

但是，宋国只是庄子的出生地，庄子其人的气质与神采，《庄子》一书的文化气息，却不为地域所限，不被宋国所囿。这正如王维是北方人，祖籍山西，而他的诗歌和绘画作品却一派南方气象。宋文化是什么样的呢？要了解一事物，最好追溯它的由来。西周初期，商纣王的哥哥（“庶兄”）微子启被周公封于商丘，国号为宋，是为宋国的开国之祖。宋是商之后，自然延续了商文化的某些品格。汉代学者有“商尚鬼，周尚文”的说法。“商人信仰鬼神与上帝，带有浓重的宗教气。……和此相关的，是商人好玄理，他们往往重理想胜过于人生之实际。”^②

在《庄子》一书中，宗教气息已颇为淡薄。闻一多写过一篇《道教的精神》，认定老庄思想的前身是“古道教”，此“古道教”是相对于东汉以来的“新道教”而言的。闻一多指出：“后世的新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，但真正接近道教的宗教精神的还是庄子。《庄子》书里实在充满了神秘的思想，这种思想很明显的是一种古宗教的反影。”“我们现在也可就宗教思想的立场，

① 崔大华：《庄学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7，第8~9页。

② 钱穆：《庄老通辨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，第3页。



说庄子的神秘色彩最重，与宗教最接近，老子次之，杨朱最切近现实，离宗教也最远。”^①此说别出心裁，不过有些牵强。牵强者有四。^①较之道家，注重祭祀和礼仪的儒家，与“古宗教”的连续性更为明显。李泽厚说：“‘礼’是颇为繁多的，其起源和其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。”“它的一个基本特征，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。”^②自李泽厚以来，儒家之礼来自宗教性的原始巫术礼仪的观点，几乎已是共识。即如闻一多，也承认儒家“也是从宗教衍化或解脱而来”，但他同时说，作为儒家源头的宗教“和各古道教截然是两回事”，何以不同？“对于灵魂的承认与否，便是产生儒道两家思想的两个宗教的分水岭”。^③这种说法是难以服人的，因为很难想象一个不承认灵魂的原始宗教。^②所谓“古道教”既然以“道”为名，则说明“道”的地位已极为崇高，而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^③《庄子》一书固然如闻一多所说，颇有神秘色彩，但在我们看来，“神秘”不过是难以言说或不可言说罢了，就此而言，神秘未必通向宗教。艺术经验是神秘的，爱情也是神秘的，日常生活经验都有几分神秘性。我们将会看到，《庄子》之所以有几分神秘气息，那是由于庄子的哲学之思触及“前语言”的领域，而这种“前语言”的经验，与其说是宗教经验，不如说是艺术经验。^④我们知道，宗教赖于信仰，哲学崇尚怀疑，而庄子正是中国哲学史上怀疑主义的宗师。庄子几乎怀疑一切。他怀疑以往的“圣人之言”“先王之道”，怀疑流俗的价值观，怀疑道德（仁义），怀疑知识，怀疑理性，怀疑语言，甚至怀疑“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，胡蝶之梦为周与”。

与商文化相比，庄子抑信仰而扬怀疑，轻宗教而重哲学。庄子虽也“好玄理，重理想”，可算是“理想主义者”，但庄子绝非凌虚蹈空的玄想者。刘熙载早已察觉，《庄子》一书是“寓真于诞，寓实于玄”（《艺概·文概》）。庄子的哲学，是立足于现实的哲学；庄子哲学的理想主义，是洞烛了现实之后形成的理想主义。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遣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”（《天下》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庄子哲学精神的双翼。但宋毕竟并不是商，而只是始于商。宋国的文化还有另一副面孔，显得

① 《历史动向：闻一多随笔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，第110、112页。

② 李泽厚：《中国思想史论》上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，第13、12页。

③ 《历史动向：闻一多随笔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，第115页。

过于板滞，不灵活，乃至有点呆气，这在宋人“拔苗助长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、“守株待兔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等著名故事中可见一斑，我们很难将它们与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这种天马行空的庄子形象联系起来。

一般认为，在文化气息、文字与思想的风格上，《庄子》一书明显带有楚文化色彩。在宋代，便有学者主张庄子是楚国人。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，六国时，楚有蒙县，俗为小蒙城，即庄子本邑。”朱熹说得更是直截了当：“庄子自是楚人，……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五）现代学者中附议此论者，不乏其人。不过他们说的“楚人”，所指并非历史中的庄子，而是作品中的庄子。如朱自清在《经典常谈》中说：“庄子名周，宋国人，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。”^①现代学者还提供了种种论证，其要点有二。第一，《庄子》中的那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和充满想象的描写，似与楚国文化有甚深渊源。第二，《庄子》多用楚语。例1：《逍遥游》“螭蛄不知春秋”，“螭蛄”是楚语中蝉的名称。例2：《人间世》“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”，“迷阳”是楚方言中的一种有刺的野草。

于是，庄子似乎拥有两个国籍。在现实中，他是宋人；在文字里，他是楚人。一些庄子研究者为了弥合其间的距离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：庄子是宋人，但他的祖先是楚人。例如崔大华说：“庄子是宋国人，但和楚国文化有很深的关系。……庄子可能是在楚国吴起变法期间，被迫迁移到楚国北陲，最后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后裔。”^②杨义专门著有《庄子还原》一书，其主旨之一就是论证“庄子是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的后裔”。这种观点的提出，至少有助于解释如下两个事实。

其一，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载：“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”试问庄子若非“楚国公族的后裔”，楚威王凭什么“许以为相”？仅凭“庄周贤”恐怕是不太可能的。王维《漆园》诗云：“古人非傲吏，自阙经世务。偶寄一微官，婆娑数枝树。”王维看得清楚，庄子“自阙经世务”，他的思想不切实际，不能用以经国济世；“偶寄一微官”自是不

① 朱自清：《经典常谈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4，第97页。

② 崔大华：《庄学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7，第29页。



妨，主宰国事却难以胜任。能力不够，身份来凑。唯有庄子的“楚国公族后裔”的身份，才能赢得楚威王的延请。

其二，庄子为何对儒家学说持批判态度。这与儒道两家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。儒家学说继承和发扬的是周文化。儒家的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子乃“周之顺民”，“吾从周”是孔子的口头禅。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甚至把不复梦见周公视为自己生命衰微的表征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！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庄子的文化理想与孔子大相径庭。无论他的文化源头是殷商文化还是楚文化，都可以较为顺理成章地说明庄子为何对孔子不以为然，为何要“诋訛孔子之徒”，“剝剥儒、墨”。

2. 诋訛孔子之徒；剝剥儒、墨

“诋訛”首先就是“抵制”，但比抵制犹有过之，还有“轻蔑、诋毁”之意。庄子所处的时代，儒墨两家思想为当世显学，最有势力，庄子对两家均不认同。“剝剥儒、墨”，也就是驳斥、攻击儒家和墨家。而他对儒家、“孔子之徒”颇有不共戴天之势，批判起来，不遗余力，剥皮抽筋，入髓入骨。司马迁指出：“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，岂谓是邪？”（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）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提醒道：“应该记住，道教与其正统的后继者——禅宗一样，在精神上代表着南方中国的个人主义的倾向，与北方中国体现于儒教中的集体主义是水火不容的。”^①林语堂也说：“西方人不必再批评孔子，因为单单庄子一个人对他的攻击就已经够严苛了。”^②在《庄子》中，这本来是白纸黑字、毫无疑义的。然而有人偏要做翻案文章，比如苏轼的《庄子祠堂记》：

谨按《史记》，庄子与梁惠王，齐宣王同时，其学无所不窥，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胠篋》，以诋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此知庄子之粗者。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，要不可以为法耳。楚公子微服出亡，而门者难

^① 冈仓天心：《中国的美术及其他》，蔡春华编译，中华书局，2009，第115页。

^② 林语堂：《老子的智慧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，第10页。

之。其仆操捶而骂曰：“隶也不力。”门者出之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。以仆为不爱公子，则不可；以为事公子之法，亦不可。故庄子之言，皆实予，而文不予，阳挤而阴助之，其正言盖无几。至于诋訾孔子，未尝不微见其意。其论天下道术，自墨翟、禽滑厘、彭蒙、慎到、田骈、关尹、老聃之徒，以至于其身，皆以为一家，而孔子不与，其尊之也至矣。

苏轼认为，司马迁对庄子“诋訾孔子之徒”的判断，仅仅是“知庄子之粗者”，对庄子的了解过于粗糙，甚而限于皮毛。据他说，庄子的做法乃是“倒行逆施”的权宜之计，或是延续老子“正言若反”的言说方式。因而苏轼主张“庄子盖助孔子者”，“实予，而文不予，阳挤而阴助之”。庄子骨子里头是推崇孔子的，而且“尊之也至矣”。

苏轼之前，就有韩愈怀疑庄子出于儒家，但韩愈之说，其影响力不及苏轼。苏轼之说一出，应者云从。现代学者中，钱穆、郭沫若、钟泰三人最有代表性。钱穆说：“今若仅就其粗迹观之，则庄周所持之政治理想，若与孔门儒家相距绝远，但若观之于深微，则庄周思想之于孔门儒家，实有其一番蜕化之痕迹，犹可推寻而得也。”这是复述苏轼，钱穆还在此基础上推测：“若谓庄子思想，诚有所袭于孔门，则殆与颜氏一宗为尤近。”^①郭沫若说：“《庄子》书中虽然很多地方在菲薄儒家，如像《杂篇》中的《盗跖》、《渔父》两篇更是在痛骂孔子，但那些都是后学者的呵佛骂祖的游戏文字，而认真称赞儒或孔子的地方，则非常严肃。”这也是继承苏轼之说，郭沫若还更进一步，勇于提出创见：“韩愈疑庄子本是儒家。出于田子方之门，则仅据《外篇》有《田子方》篇以为说。这是武断。我怀疑他本是‘颜氏之儒’。”^②钱穆不过猜测庄子近于“颜氏一宗”，郭沫若则直接断定庄子本是“颜氏之儒”。

钟泰也服膺苏轼的观点，主张“庄子之学，盖实渊源于孔子，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”，这与郭沫若的观点相似，倒也罢了，钟泰还认定庄子思想并不与老子相近：“庄子之非神仙家，今之学者或能辨之；若其非道家而

① 钱穆：《庄老通辨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，第136~137、148页。

② 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·庄子的批判》，转引自再云飞编《庄子二十讲》，华夏出版社，2009，第70页。



不同于老子，则能辨之者鲜矣。”不同于老子，这应当说很正常。庄子不同于老子，正如孟子不同于孔子。但钟泰说的是“非道家而不同于老子”，在逻辑上就相当于说孟子“非儒家而不同于孔子”，这就走极端了。因此钟泰干脆断言：“庄子之为儒而非道，断断然矣。”^①

今天看来，苏轼“庄子盖助孔子者”的观点未必经得起推敲，由此延伸而来的“庄子本是颜氏之儒”“庄子为儒而非道”的说法也是很成问题的。为什么苏轼的观点与司马迁的观点完全不同呢？倘若借用姚斯（H. R. Jauss）的接受美学的术语，这是由于他们的“期待视野”（Erwartungshorizont）不同。要评判苏轼的观点，有必要了解他的期待视野。或者通俗地说，我们应当将苏轼的观点还原到学术史，还原到当时的知识氛围之中。

唐宋之前，道家和儒家基本上是对立的。汉朝初年就有《诗经》学博士辕固生将《老子》讥为妇孺之见（“此是家人言耳”）。相传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作了一篇《难庄论》，可惜文章已经亡佚。西汉末年的大儒扬雄批评庄子“罔君臣之义，衍无知于天地之间，虽邻不覿也”（《问道篇》）。扬雄不屑于与庄子做邻居，可视为与道家“势不两立”的具体化。儒家对道家如此，道家对儒家也是如此。魏晋时期，道家人物嵇康则主张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（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），提倡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（《养生论》）。“名教”即孔孟之道的“礼教”。儒道势不两立，一目了然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西晋郭象首倡“名教即自然”之说，为填补儒道之间的深沟巨壑埋下伏笔。唐宋以后，中国文化已呈“三教合一”之势，佛、道均合于儒，或者说，儒家学说已然凌驾于，乃至在某种意义上吞并了佛家和道家学说。“儒道两立”正式演变为“儒道互补”，只不过名曰“互补”，其实是以儒为主，以道补儒。在此时代背景下，“以儒解庄”成了宋代学者自然而然的选择，不独苏轼为然。因此在苏轼看来，庄子和孔子之间，决非什么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反倒是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——这里的“道”，自然是儒家之“道”、孔子之“道”。“以儒解庄”带来一个有利的后果，那就是儒家可以不必直面庄子的批判，不必感受难以回应庄子之批判的尴尬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儒家思想丧失了一统天下的功能，我们的“期待视野”又发生了变化，孔子之道，也已不能贯通庄子之道。我们应当还庄子之

^① 《钟泰学术文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2，第3~4页。

本来面目，放弃苏轼之说，重拾司马迁之说。

只要面对《庄子》文本，自然就能还庄子一个“诋訛孔子之徒”的本来面目。苏轼以为将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让王》《说剑》诸篇判为伪作，即可将庄子罗致于孔子麾下，但是，对儒家思想的批判，不只见于这几篇“伪作”，整部《庄子》中触目皆是。正面驳斥，旁敲侧击，声东击西，挖苦，讽刺，揶揄，……应有尽有，而且往往力透纸背、入木三分。

举例来说，孔子思想的核心，无非“礼”和“仁”。礼是孔子对周文传统的继承，仁是孔子对周文传统的发扬。何谓礼？《荀子·礼论》说：“礼者……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，皆有称者也。”何谓仁？《论语·颜渊》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：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礼与仁是连在一起的。礼偏于外，仁偏于内。礼是对人的外在规范，仁则是礼的内化，也就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和强制改造为内在的情愿与自觉，所以说“为仁由己”。礼的“内化”或自觉化，从另一方面说，也是礼的权威性和束缚力的深化，即深入对个人的视听言动的规范。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安分守己，克己复礼，长此以往，习惯成自然，达到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地步，那就是“仁”。简言之，礼就是社会规范，仁就是自觉而情愿地接受社会规范。但是，凡人都渴望自由自在，怎么可能自觉而情愿地接受规范呢？这就需要在人心中找到“仁”的依据。孔子认为，这个根据就是本能的血亲之爱，天然的血缘情感。具体言之，即孝、悌，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欤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以孝悌为仁的根本，孔子便完成了为苦药金鸡纳霜（Quinine）裹上一层糖衣的工作。

然而，庄子对儒家的礼与仁都没有好感：

礼者，道之华而乱之首也。（《知北游》）

礼者，世俗之所为也；真者，所以受于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故圣